

## 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博阿斯学派新解

刘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学界一般认为, 博阿斯学派提倡历史的方法, 反对思辨的方法, 重点研究特定民族的文化史, 因此又被称为“历史特殊论学派”或“文化历史学派”。事实上, 博阿斯学派具有“反历史”倾向, 与历史研究之间一直存在张力, 由此折射出一种特殊的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 对美国文化人类学, 尤其是美国历史人类学的发展演进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深入揭示, 为全面解读博阿斯学派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关键词〕 博阿斯学派; 历史; 结构; 历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C9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7) 01-0043-08

从学界以往对博阿斯学派的解读和认知来看, 如何看待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是理解该学派的一个重要维度。长期以来, 学界多认为博阿斯学派提倡历史的方法, 反对思辨的方法, 重点研究特定民族的文化史, 称其为“历史特殊论学派”或“文化历史学派”。本文通过对有关著述进行梳理和解读, 揭示出博阿斯学派具有“反历史”倾向, 与历史研究之间一直存在张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和论证这种张力的内在动因、学术价值及影响, 由此彰显博阿斯学派在美国历史人类学发展演进中的特殊地位。

### 一、博阿斯学派：一般特点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 在美国人类学职业化、专业化及形成独立的学术性学科的过程中, 博阿斯 (Franz Boas, 国内学界通常也译为鲍亚士或博厄斯, 1858-1942) 和他的学生们做出了重要贡献。1899 年, 博阿斯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个人类学教授; 在他的领导下, 美国

最早的人类学系得以组建。博阿斯和他的学生们组成的博阿斯学派, 一直引领着 20 世纪前 30 年的美国人类学,<sup>[1] (P. 1)</sup> 对之后美国乃至西方人类学的发展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鲍亚士领导一代人类学家脱线性演化论而转向文化史研究, 并且率先批评种族理论……配合着时代精神, 社会科学界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们已经不再以维持现存社会的枝枝节节及为它们找藉口作为目标。他们正尝试着更精确地描述社会, 从新的观点去了解它、改造它”。<sup>[2]</sup> 博阿斯学派既批判 19 世纪“书斋”人类学家推测历史的研究方法, 力主亲身进行田野调查; 同时, 也批判单线进化论、欧洲中心论, 提倡文化相对主义。到 20 世纪 20 年代, 博阿斯倡导的田野调查方法已经成为美国人类学的标准模式, 进化论思想在美国人类学界几乎消失。<sup>[1] (PP. 1-2)</sup>

1900-1930 年间, 博阿斯和他的学生们热衷于具体文化的纯客观描述, 在对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志资料进行分类归纳时, 生产了以“文化

〔收稿日期〕 2016-09-18

〔作者简介〕 刘海涛 (1971-), 男 (汉族), 河北晋州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 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历史人类学研究。

\* 2016 年 9 月 10 日, 在《民族研究》编辑部与西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 区域社会、民族走廊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的分组讨论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蔡华教授在点评此文时给出了针对性的完善意见, 在此特致谢忱。另外, 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编辑部和各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中肯的建议。

区”(culture area)<sup>①</sup>为核心的一系列分析概念。他们在一个有限的文化区内,基于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而谨慎地致力于有限的局部的历史复原,并尽可能避免一般化的理论建构。<sup>②</sup>博阿斯指出,美国人类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北美印第安族群上,在现代文明把这些族群特有的生活方式抹去之前,研究者基于个人的亲历观察,以民族志描述的方式,尽可能多地生产有关这些族群的历史叙述。博阿斯坚信,只有生产了足够的科学的历史叙述,人类学家才能对文化过程进行理论概括。<sup>[1] [P.2]</sup>这一时期,在博阿斯的影响下,这种所谓的文化史研究类型统治了美国人类学界:他们主要依靠分析民族志数据,来确定地理上相邻文化之间的文化传播,来重构文化变化的时间序列。<sup>[3]</sup>

20世纪30-40年代,以博阿斯的学生克鲁伯(A. L. Kroeber)、卡丁纳(Abram Kardiner)、林顿(Ralph Linton)、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为代表,形成了所谓“心理结构”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开始对文化和人性的相互作用、基本人格类型感兴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及格式塔心理完型等技术被应用到美国人类学研究中来,<sup>[4] [pp. 18-19]</sup>形成了所谓的文化模式研究类型。

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 1880-1939)作为博阿斯学派的重要成员,曾对他们这一学派的主张进行了总体归纳“历史学派的原则,简单述之,不外下列诸种:集中研究于一定的地理历史区域内,一方面求纵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调查横的部落间的接触。在追寻文化特质及文化丛的途径时,应用客观及统计的方法。在研究文化的关联、互相吸收及同化诸问题上,则应用心理学方法。在描写部落文化或区域文化,尤其是关于吸收内生或外来的新文化特质时,使用文化式(culture style)或文化型

(culture pattern)的观念。在一文化区内,尤需使用甄别的方法,分别研究较部落小的单位间及个人间的差异。如遇需要确定某种文化特质(culture trait)的标准意义或决定其价值时,则应用语言的方法。注意分析文化丛(cultural complex)的历史及心理成分,否认古典式的进化论及环境论;采用‘传播’、‘独自发明’、‘并行论(Parallelism)’、‘凑合’(Convergence)等概念,惟并不视为武断的理论而仅为追求真理的工具而已”。<sup>③</sup>

总之,博阿斯学派大体包括两个发展阶段,先后形成了1900-1930年间所谓的文化史研究类型,以及1930-1940年间所谓的文化模式研究类型。无论是哪种研究类型,都充分体现了博阿斯学派整体一直秉承的文化决定论的学术风格。

## 二、博阿斯学派:与历史研究之间存在张力

从国内外学界对博阿斯学派的有关解读与批评来看,概而言之,存在两种不同的见解:其一,如前所述,也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主流见解在于,博阿斯学派提倡历史的方法,反对思辨的方法,认为每个文化集团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不赞成从各民族独特历史中得出普遍、抽象的理论或发展规律的进化论观点。由此,博阿斯学派又被称为“历史特殊论学派”或“文化历史学派”。<sup>[5]</sup>他们“对于演进论或传播论都加以批评,自己在积极方面则提出一种历史的方法”,因此又有“批评派和历史派”(Critical or Historical School)这两种名称。<sup>④</sup>也有学者把博阿斯学派称为“美国历史学派”。<sup>[6] [P. 143]</sup>

其二,另一种看法是,博阿斯学派源于对进化学派的批评以及对德奥地理传播学派的继承,

① “文化区”(culture area),即一个共享同一生态区位的共同的传统文化传统,参见克莱德·M·伍兹著,何瑞福译《文化变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这种文化区研究,只限于它的历史地理的所在,就自然环境、邻近文化及许多错综复杂的心理学上的组合所形成的在文化上的不同方面作一透视。参见戴裔焯《西方民族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原计划于20世纪40年代初出版,见该书的出版说明),第298页。

② 参见克莱德·M·伍兹著,何瑞福译《文化变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即吴奈所做的中译本序,以及该书的第119页。

③ 戈登威泽著,陆德音译《文化人类学》(《历史、心理学与文化论文集之社会科学史纲第五册》,本书原名为《文化传播辩证论集》,1932年出版),载斯密斯等著、周骏章译《文化的传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影印),第316页。也可参见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329、479-480页。

④ 参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1934年第1版),第40页;杨成志《人类学的发展鸟瞰》,载《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该文原载《民族学研究集刊》1943年第3期),第328页;戴裔焯《西方民族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原计划于20世纪40年代初出版,见该书的出版说明),第294-324页。

多注重资料在空间上的不同,而忽视资料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连续性;强调文化区、文化圈等地理性概念,强调文化特点的相互关系在于心理基础,把心理现象作为第一性的东西。他们虽以历史学派自命,并认为重视历史因素,多采用历史观察法,但实际上却是反历史主义的。<sup>[7]</sup>也有学者认为,该学派所说的“历史”是对各种文化现象、“文化区”、文化特点和传播做经验性机械的描述,多舍本求末地记载许多琐碎的文化现象并加以整理分类,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决定论。<sup>[8]</sup>

事实上,后一种见解,即批评博阿斯学派忽视历史研究,对土著历史重构缺乏兴趣,认为博阿斯学派与历史研究一直存在张力的观点,虽不是目前的主流看法,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揭示和延伸论证。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美国新一代人类学家,如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开始反思统治美国人类学多年的博阿斯学派。他们将博阿斯学派的所谓历史研究称为“拯救式人类学”(salvage anthropology)<sup>①</sup>和“古文物收集”。在这种“拯救式人类学”研究中,调查者多忽视引发印第安族群传统生活方式变化的因素,其目的在于生产具有长久特性的族群生活方式的“民族志照片”,多依赖族群长者的记忆来构造特殊生活方式的印象——大量的所谓历史研究却没有产生重要的概括。<sup>[1](pp.2-3)</sup>

战后以来,这类批评更为集中和深入。*ethnohistory* 期刊(1954年创刊)的重要创办人沃格林(Erminie W. Voegelin)曾这样评价美国博阿斯学派“他们对长时段的历史研究缺乏兴趣,但依然被认为具有历史性。他们以特殊文化的增长和变化为第一要务,而不是以一种历史的观点来研究长时段,同时忽视了档案文献的作用,对历史重构问题不感兴趣。”<sup>②</sup>

科恩(Bernard S. Cohn)在总结20世纪70

年代之前族群史(ethnohistory)<sup>③</sup>研究的特征时指出:美国文化区学派,或历史学派,主要依靠对具体的文化特质(culture trait)和文化丛(cultural complex)进行分区(distribution)研究,忽视档案和口述历史(oral histories)的使用,倾向于生产来自某一地区的无时间画面,或关于某一特殊记忆文化的描述性的共时叙述。他们基于从健在的美国印第安部族长者成员的“记忆文化”中来揭示文化和社会细目。这些细目,即物质文化或语言学数据,在地理学的意义上是分散的,被用来揭示部族间的历史和年代关系。因此,实际上,他们并不关心某部族的历史。<sup>[9](p.441)</sup>科恩在谈及族群史(ethnohistory)研究的先驱时,没有提到或很少提到文化传播理论,也没有提到博阿斯,同时把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排除在族群史研究之外。<sup>[10](p.42)</sup>换言之,科恩未把博阿斯学派视为族群史研究的类型,不认为博阿斯学派从事的是一种历史研究,最多算是一种文化传播或者文化涵化研究。

尤勒(Robert C. Euler)认为,该学派在名称上被称为美国历史学派,但实际上有些自相矛盾,因为从其表现来看,基本上是一种共时研究。该学派的调查者们,一般找到印第安人中的老者,作为自己的信息提供者,同时假设他们所提供的叙述是土著生活的真实反映(他们并不直接使用历史材料)。尤勒还举出实例,历数了该学派成员由于忽视档案材料所造成的诸多缺陷:1918年,该学派成员施皮尔(Leslie Spier)在共时性描写和论述当地酋长的时候,得出了人群中酋长并不重要的结论;如果施皮尔能够使用和分析早期的历史文献,就能知道酋长在人群中的领导关系在40年前是如此的重要。1928年,施皮尔根据有关盎格鲁美国人版图拓展的历史讲述,试图弄清楚哈瓦苏派(Havasupai)印第安人的土地使用情况,由此得出结论——沿着现在的圣菲铁路线,存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巨大版图拓展;要是施皮尔能根据他广泛注意的文化模式来

① “拯救式人类学”的内涵在于,研究者基于个人的亲历观察来生产有关印第安族群的历史叙述,在现代文明把这些种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抹去之前,尽可能多地生产他们的民族志描述。

② Erminie W. Voegelin, “An Ethnohistorian's Viewpoint,” *Ethnohistory*, Vol. 1, No. 2. (Nov., 1954), p. 167.; 还可参见 Robert M. Carmack, “Ethnohistory: A Review of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s, Methods, and Aim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1. (1972), p. 228.

③ 笔者在《世界民族》2014年第2期《二战后族群史研究凸显于美国学界的动因分析》一文中,尝试将 ethnohistory 这种学术现象译为“族群史研究”,并视之为西方历史人类学中的一种代表性研究类型。这种翻译方式和处理方式,有待深化,可供学界批评与讨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蔡华教授在点评该文时指出,ethnohistory 最好译为民族史,正如 ethnology 译为民族学一样。

分析有关的档案材料，结论上就会有新的发现。<sup>[11] (P. 202)</sup>

无论是沃格林、科恩还是尤勒，都曾对萨丕尔 (Edward Sapir) (博阿斯学派成员) 研究美洲土著文化的专著《美国土著文化中的时间观念》(*Time Perspective in Aboriginal American Culture*, 1916 年出版) 进行过评析，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他们都认为，虽然萨丕尔用长达 86 页的篇幅建立起一种时间的视角，重视美国土著文化中时间观念的研究 (就整个博阿斯学派而言，他们显然对此有所忽略)，但该著作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只有 5 页涉及直接历史证据 (direct historical evidence) 的使用；在这 5 页之中，又只有 1 页涉及民族学研究文化增长和变化中所用的档案证据。<sup>①</sup>

在卡马克 (Robert M. Carmack) 看来，“博阿斯等美国文化史学家，正如他们的英国伙伴，一般不使用档案资源，民族志调查是其研究的必要条件。从部分意义上讲，这对迅速消失的土著文化是一种反映，但同时显示出对历史资源和历史问题的不信任和缺乏兴趣”。<sup>[12]</sup>

特里杰 (Bruce G. Trigger) 认为，博阿斯学派研究的是土著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历史、体质和语言，没有把因欧洲人的到来而引发的土著生活变化作为研究的主要部分。他们一般认为，土著文化是相对稳定而缺少变化的。在作为美国人类学传统分支的史前考古学中，虽强调了历史的观点，但也把土著文化视为静态 (static) 的：在这些史前时代的文化中，地区之间的变化能够在地理学意义上看到 (如文化区理论)；考古学家记录中体现的变化，反映了族群如是运动，即把静态的 (static) 文化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sup>[13]</sup>

赖利 (Carroll. I. Riley) 在对博阿斯学派进行整体评估时指出“历史重构并不是博阿斯学派的目的，只是因为它是博阿斯学派用以攻击其他学派，尤其是有关文化动力学中的其他基本问题的有力工具。”<sup>[4] (P. 18)</sup>

此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博阿斯学派与历史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在博阿斯学派对族群史 (ethnohistory) 研究的排斥上。

博阿斯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博阿斯的学生威斯勒 (Clark Wissler) 很早就使用 ethnohistory 概念，并给出了有关的解释，但同时表示出对这种研究类型的不满“从整体上而言，一般的史前文化重构，所依靠的就是所获得的 ‘ethnohistorical’ 数据和考古学数据的联合，但是，这种方法被证明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找到古代的地方证据，也没有指示出继承下来的或当今的文化类型”。<sup>[14]</sup>

博阿斯学派对这一时期族群史研究的有关作品也持批判态度。博阿斯的弟子罗维 (R. H. Lowie) 曾攻击了族群史 (ethnohistory) 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斯旺顿 (John R. Swanton) 和狄克逊 (Roland B. Dixon) 的有关著述，对他们有关北美印第安移民研究中使用的口述传统和旅行者的叙述材料进行了批评。罗维公开指出，原始人不具有历史意识和历史观点，他甚至认为，人类学家的历史问题之解决，只能靠比较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客观主义的方法。<sup>[9] (P. 441)</sup> 在其 1915 年的论文中，罗维在对斯旺顿和狄克逊的有关见解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不能将口述传统 (Oral Tradition) 与任何的历史价值联系起来，无论在何种条件下。我们不能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实的……口述传统是多余的，因为语言学、民族学和考古学数据，对于建立有关问题的结论，已经足够了。口述传统也不会给语言学比较有所助益。如果由于其他方面的证据缺乏，而使用口述传统来进行历史的重构，这就必须受到阻止，这是基于方法论上的谨慎考虑”。“涉及遥远过去的口述传统，只能为语言学、考古学或者其他的调查提供一个出发点，我们对土著历史的知识最终主要依赖于这些

① 参见 Erminie W. Voegelin, “An Ethnohistorian’s Viewpoint,” *Ethnohistory*, Vol. 1, No. 2 (Nov., 1954), p. 167.; 还可参见 Robert M. Carmack, “Ethnohistory: A Review of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s, Methods, and Aim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1 (1972), p. 228.; Bernard S. Cohn, “Ethnohistory,”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Volume 5, p. 441.; Robert C. Euler, “Ethno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Ethnohistory*, Vol 19, No. 3 (Summer, 1972), p. 202.

语言学、考古学或者其他的调查等研究”。<sup>①</sup>

从某种意义讲，以亲身田野调查为主，较少涉及直接的历史档案证据，注重历史地理意义上的文化变迁——即把静态的（static）文化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强调结构和心理因素，占据战前美国文化人类学主导的博阿斯学派，客观上限制了附着在美国文化人类学学科脉络中生存发展，以土著历史的文化重构为目的的族群史（ethnohistory）研究的发展空间，成为20世纪上半叶族群史研究一直发展缓慢的重要阻碍力量。正如尤勒（Robert C. Euler）所指出的“族群史（ethnohistory）在美国学界发展延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至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类学一直受到博阿斯学派的统治。”<sup>[11] P. 202</sup>

总之，“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在过去和现在的美国民族学中的地位问题是复杂的”。<sup>[15]</sup>一方面，博阿斯学派在批判古典进化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德奥文化传播论的有关思想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发生了由地理空间探讨到心理结构研究的转变，形成了自己的重点研究特定民族文化史的风格和传统；另一方面，在博阿斯学派发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与历史研究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的存在，并不能说明20世纪上半叶一直统治美国人类学界的博阿斯学派与历史研究之间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但至少可以承认的是，诚如克鲁伯评价的那样：“（这一时期）美国文化人类学具有反历史的倾向（anti-historical in tendency）”，<sup>②</sup>“在美国，我们几乎专一地依赖于传播主义和独立的地区发展，用以解释文化是如何发展成现在

这样的。民族志作者从应该长时间驻足于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展开族群运动的研究中退却”。<sup>③</sup>

### 三、博阿斯学派：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

在某种意义上讲，博阿斯学派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张力，尤为突出表现在博阿斯学派内部关于“历史研究”的博弈<sup>④</sup>之中，由此清晰折射出博阿斯学派所持有的一种特殊的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换言之，之所以博阿斯学派与历史研究之间一直存在张力，与博阿斯学派秉承的这种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有着直接的联系。如前所述，为数不多的一些中外学者，已经认识到博阿斯学派与历史研究之间存在张力，但他们未能从博阿斯学派的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中，发掘张力存在的内在动因。

博阿斯认为，文化的现象只能从历史来解释，只能通过历史才能了解现在，但这个历史并不是全人类的历史，而是个别族群的历史，只能通过这个社会或民族自己的历史来了解它的文化。<sup>[6] P. 143</sup>可以说，这是该学派的整体共识，也是能够组建起博阿斯学派的主要依据和基础。

博阿斯还指出，历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事件、资料的堆砌上，以关心过程为主，即把事件本身按时间顺序罗列出来即可，无需进行重建整合，无需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整理。因为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使得只有在资料的累积达到某个程度时，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实证性的理论框架。但在他看来，资料达到这种程度的机会很小。<sup>⑤</sup>

另外，博阿斯也注意到了文化整体性的重

① Robert H. Lowie, *Oral Tradition and Histor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17, No. 3. (Jul. - Sep., 1915), pp. 598, 599.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口述材料的价值日渐彰显。很多民族学者（包括博阿斯学派在内）也逐渐认识到其重要意义。1915年之后的若干年中，在罗维的相对成熟的作品中，罗维也曾毫不犹豫地于20世纪报告人提供的信息中构造了一幅1834年前的“准历史的文本”（quasi-historical text）。参见 John C. Ewers, “Symposium on the Concept of Ethnohistory - Comment,” *Ethnohistory*, Vol. 8, No. 3. (Summer, 1961), p. 264.

② A. L. Kroeber, “History and Science in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37, No. 4, Part 1 (Oct. - Dec., 1935), pp. 539 - 569.; p. 558. 还可参见 Shepard Krech III, “Ethnohistory,” in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eds., *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6, Volume 2, p. 422.

③ 转引自 William N. Fenton, “The Training of Historical Ethnologists in Americ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4, No. 3. (Jul. - Sep., 1952), p. 329.

④ 有关争论及对此的有关评价参见：A. L. Kroeber, “History and Science in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37, No. 4, Part 1 (Oct. - Dec., 1935), pp. 539 - 569; Franz Boas, “History and Science in Anthropology: A Repl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38, No. 1 (Jan. - Mar., 1936), pp. 137 - 141.; Marc J. Swartz, “History and Science in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25, No. 1 (Jan., 1958), pp. 59 - 70.

⑤ 参见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另外，事实上这也是历史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即能不能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或者说能进行多大程度的归纳。在 Marc J. Swartz 看来，“不管如何对待、使用历史数据，都离不开有关归纳、规律等的假设。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因果解释，与所谓的纯历史描述之间的差别不大，因为它们有很多共同的因素。历史与科学，都应用一般性的陈述，使用如规则一样的原则，如果说这是二者的差别的话，那只是外在的，并不影响二者的一致性。‘好’历史与‘好’科学一样，都使用一般性陈述来为其寻求证据。”参见 Marc J. Swartz, “History and Science in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25, No. 1 (Jan., 1958), p. 69.

要，相信在理论上存在一个文化的整体观，有一个文化模式（culture pattern）的支配性概念。也正由于此，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称他为结构主义的先驱。<sup>[16]（pp. 14-25, 35）</sup>这在博阿斯为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代表作《文化模式》（博阿斯的女弟子，1934年出版）所做的序言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人们试图在各种文化特性之间建立起坚固的纽带，并利用它们建立更为广泛的历史性联系。……把一种文化的意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这种对社会-心理问题的兴趣与历史方法并行不悖……相反，它显示了文化变迁中那种具有生机的动力进程……这种处理方法与解决社会现象问题的功能方法不同，与其说它关心的是每一文化内容的功能关系，不如说它关心的是那种对基本观念的发现。除了在一般结构范围以外，它都是历史的方法，但只要这种结构延续下去，它就会对仍从属于它的变化方向予以限制。与文化内容的变化相比较，结构常常有很显著的持久性”。<sup>[17]</sup>

由上观之，在博阿斯看来，就这种文化模式的实质而言，依然是历史范畴内的问题。

博阿斯的大弟子克鲁伯是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的：博阿斯的主要兴趣在于结构间的关联、变化和过程，处理一系列与过程相关的问题——他研究的主要是“过程”，而不是“历史”。因此，“他不曾做历史（do history）”。<sup>[18]（pp. 541-543）</sup>

在批判自己导师的基础上，克鲁伯提出了他对历史研究的理解“历史方法并不主要在于处理事件的时间顺序……而在于描述性整合（descriptive integration）”。<sup>[18]（p. 545）</sup>换言之，事件本身或资料本身并不具有秩序，因此，描述出现象的整体性是如何整合起来的才是历史研究真正要关注的。因此，他把历史研究的目标具体化为“描述性整合”，即建立一种“模式”（Pattern），显示事件组织成的系统、秩序。“与其说将过程隔离，倒不如说是呈现出了一幅整合的文化画面，这种方法因此可称为动力的、功能的或者心理的方法，而最终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这似乎是

抛弃了时间的因素，而成为‘非历史’，但是，时间只是历史中的一个维度，尽管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sup>[18]（p. 556）</sup>因此，他很赞同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米德（Margaret Mead）关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心理整合的主张，认为那才是一种“理性的文化史”重建，尽管他们并没有把时间作为一项重要因素。<sup>①</sup>

以上述见解为基础，克鲁伯把过程研究与模式研究进行了对比“过程研究不能取代模式研究……但二者也并不冲突，有了过程知识，模式才能被很好地理解；而认识不到内在模式，应用过程材料就会导致不完整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sup>[18]（p. 560）</sup>“历史不会忽略过程，但过程不是历史研究的首要目标；过程是现象之间的连接，而不是从现象中抽取出来的；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一个整合现象的程序”。<sup>[18]（pp. 545-546）</sup>“一个模式并非一个过程，在现象的真实中……它是有其基础的描述的典型……当然，建立模式与寻求规则是不同的”。<sup>[18]（pp. 567-568）</sup>由此观之，克鲁伯看重的模式研究，他心目中的历史研究，与结构功能研究有相似之处，即都注重描述，并抽象出现象所呈现的不同模式及模式之间的关系，但它的目的在于建立模式，与以寻求社会规则为目的的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结构功能”论又存在明显差异。

另外，克鲁伯还将历史研究与科学研究进行了区分。克鲁伯认为，将现象析解为更为细小的过程本身，这是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做法，更适合于自然界现象的研究。而历史的探究方式，即综合的方法，尝试获取“描述性整合”，其整体构成一个模式，它并不分解被研究的资料，而视之为较大整体的部分，追溯元素之间的关系。除综合外，历史方法尽可能保存个别事件的复杂性，同时也将它们建构进一种具有一定连续性的设计中。这种方法更适合于文化和人类行为的研究。<sup>[18]（pp. 546-547）</sup>博阿斯不同意这种形式的历史研究与科学研究的二分方式。在博阿斯看来，历史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差别并不如克鲁伯所言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差别，充其量在于一个是历时

① 参见 A. L. Kroeber, "History and Science in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37, No. 4, Part 1, (Oct. - Dec., 1935), p. 557. 但在很多学者看来，本尼迪克特、米德等人背离了博阿斯历史主义的路径，从而被视为一种新的学派，即心理结构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参见托卡列夫著、汤正方译《外国民族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

(diachronic) 问题, 一个是共时 (synchronic) 问题。因此, 博阿斯并不认为在具体研究中二者必选其一。<sup>[16] (PP. 28-29)</sup>

在克鲁伯研究生涯的后期, 其观点又有了一些转变和调整, 有向其导师博阿斯回归的倾向, 但并未完全与博阿斯“言和”。克鲁伯认为, 文化人类学追求的不是通则, 而是特例, 整合出来的整体根植于特殊的情境。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分析可能是严格共时的, 但在文化形式与其更大范围的情境相关联的时候, 也会有历时分析。同时, 克鲁伯又强调, 无论是共时分析, 还是历时分析, 都不应该仅限于按年代顺序来精确排列。<sup>[10] (PP. 38-39)</sup>

综上, 博阿斯与克鲁伯关于历史研究的主要差异, 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能不能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 或者说能进行多大程度的归纳。博阿斯在使用归纳上疑虑重重, “基于确切数据的谨慎重构与多少有些空想的泛泛归纳之间, 是有区别的”。<sup>[19]</sup> 在博阿斯看来, 将事件本身按时间顺序罗列出来即可, 但这样做事实上很难做到, 需要借助如“文化模式”这样的结构性概念来实现对历史现象的描述; 而克鲁伯则提倡归纳, 当然, 他不是用之来生产通则, 而是建立模式, 意在“描述性整合”。第二, 博阿斯注重历史现象的过程性, 而克鲁伯则认为时间及过程因素并不是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维度。

总体来看, 虽然博阿斯与克鲁伯在对待历史研究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 但又明显具有一

定的共同性。从其博弈过程来看, 他们共同展示出了一中特殊的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 历史研究主要关注描述出来的现象的整体性是如何整合起来的, 即通过建立一种结构 (模式), 来显示历史事件组织成的系统、秩序, 注重结构 (模式) 间的关联和变化。

#### 四、博阿斯学派: 结构与历史的矛盾

博阿斯学派建构的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 在笔者看来, 其学术价值和影响主要在于, 不仅形塑了博阿斯学派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张力, 而且初步彰显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的结构与历史之间的矛盾, 以及为消解、整合结构与历史之间的矛盾所作的初步努力。由此也体现了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发展演进中的早期特点, 为历史人类学成为美国学界的一种重要研究范式做出了奠基性的探索和贡献。事实上, 这种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 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史观, 共同为之后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如何处理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乃至其历史人类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对博阿斯学派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进行深入揭示和论证, 有助于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进一步理解博阿斯学派的深层样态及其在美国历史人类学发展和演进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对于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基本理论研究而言, 尤其是对于我国的历史人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而言,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 (参考文献)

- (1) Clifford Wilcox. Robert Redfie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4: 1-3.
- (2) [美] 霍夫斯达德著 (郭正昭译). 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1: 188.
- (3) Robert M. Carmack. Ethnography and Ethnohistory: Their Application in Middle American Studies [J]. Ethnohistory, 1971, 18 (2): 127.
- (4) Carroll L. Riley. America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 appraisal [A]. In: Carroll L. Riley and Walter W. Taylor eds. America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essays in honor of Leslie Spier [C],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7: 18-19.
- (5) 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68.
- (6) 乔健. 美国历史学派 [A]. 周星, 王铭铭主编. 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 [C],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143.
- (7) 陈永龄, 王晓义.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 [A].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民族学研究 (第一辑) [C]. 民族出版社, 1981: 278.

- (8) 吴泽霖,张雪慧. 简论博阿斯与美国历史学派 [A].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民族学研究 (第一辑) [C]. 民族出版社,1981: 322-324.
- (9) Bernard S. Cohn. Ethnohistory [A].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Volume 5. 441.
- (10) James D. Faubion. History in Anthropology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3, (22): 38-42.
- (11) Robert C. Euler. Ethno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J]. Ethnohistory, 1972, 19 (3): 202.
- (12) Robert M. Carmack. Ethnohistory: A Review of Its Development, Definitions, Methods, and Aims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1, (1): 228.
- (13) Bruce G. Trigger. Ethnohisto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 Ethnohistory, 1982, 29 (1): 3.
- (14) Clark Wissler. Introduction [A]. In: Clark Wissler ed. The Indians of Greater New York and the Lower Hudson [C], New York: Anthropological Papers,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 3, 1909. xiii.
- (15) [苏] 托卡列夫著 (汤正方译). 外国民族学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312.
- (16) 林开世. 鲍亚士 [A]. 黄应贵主编. 见证与诠释——当代人类学家 [C], 台北: 正中书局, 1992: 14, 25, 28, 29, 35.
- (17) 博阿斯. 序言. 本尼迪克特著 (何锡章等译). 文化模式 [M]. 华夏出版社, 1987. 1-3.
- (18) A. L. Kroeber. History and Science in Anthropology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935, 37 (4), Part 1: 541-568.
- (19) Franz Boas. History and Science in Anthropology: A Reply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1936, 38 (1): 140.

## A Structural View of Histor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Boas School

LIU Hai-tao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In academic circle, it is a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Boas school advocates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opposes analytical method in studying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 particular ethnic group. Hence it is also called the School of Historical Particularism or Cultural-historical School. In fact,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tension between Boas Schoo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and its anti-history tendency reflects a special view of hist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n in-depth study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Boas School.

**[Key words]** Boas School; history; structur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责任编辑 红 梅)